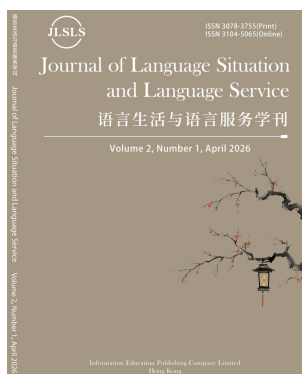




JLSLS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JLSLS, Vol. 1, No.1, 2026, pp.31-44

Print ISSN: 3078-3755; Online ISSN: 3104-506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sl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sls260103daiic>

话语分析法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展望：基于中国国内的研究现状

陈棣棋（Chen Diqi），单韵鸣（Shan Yunming）

摘要：话语分析作为一个术语自提出以来已有七十余年历史，是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工具。本文系统梳理中国国内相关文献，先概述话语分析法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应用现状，再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反思，从提升对多模态语料的关注、注重理论应用框架搭建与优化、增加受众视角融入、加强对积极话语的挖掘四个维度提出方法应用路径的优化方向与未来研究展望，为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

作者介绍：陈棣棋，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电邮：jccdq@mail.scut.edu.cn。单韵鸣，通讯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文化协同创新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国际传播。电邮：ymshan@scut.edu.cn。

Title: Discourse Analysis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Prospec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term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tool i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field. Furthermore, based on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current literature, it explores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from four aspects: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multi-modal data, strengthening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incorporating audience perspectives, and enhanc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he discourse.

Key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uthor Biographies: **Chen Di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jccdq@mail.scut.edu.cn. **Shan Yunm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mail: ymshan@scut.edu.cn.

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成为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中心角色,围绕语言进行的文本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二十世纪下半叶,符号学、言语行为学等学科理论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文本研究中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界限,产生了一种跨多学科领域的聚焦于交际语言使用状况的研究,话语分析学应运而生(丁和根,2004)。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话语分析实现了语言使用和社会研究相结合,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如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魏江楠,2018)。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注,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话语分析学的理论内涵。在全球化语境下,话语分析也发展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工具。在话语分析和该领域的结合中,产生了媒介帝国主义、全球化传播等理论视野(胡春阳,2007)。

自话语分析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以来,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其方法论体系和理论内涵也在和各学科的融合应用中不断完善扩充。因此,对其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中的应用现状,以及方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反思,对更好地在未来研究中把握话语分析法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话语分析的流派分支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概念最早于1952年由美国语言学家Harris在《话语分析》一文中提出。他在文中指出这是一种“连贯的言语(或文句)的分析方法”,并对一则广告进行分析,探讨句子与句子间的关系、文本与文化间的关系等问题(Harris,1952)。

在跨学科的发展中,话语分析逐渐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流派分支。Cook关于话语分析流派分类的观点颇具影响力,他将话语分析分为英美学派、以Foucault的理论为基础的学派,以及批评话语学派。

英美学派是最早开展话语分析研究的流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Firth对语境中言语意义的探讨。该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内容涵盖语篇结构、会话分析等(黄国文、徐珺,2006)。

以 Foucault 的理论为基础的学派关注话语的社会构建作用,将研究重点放在话语所反映的社会实践相关的问题上,探讨话语秩序、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等话题(杨絮,2018)。

批评话语学派综合了上述流派的部分观点,以社会、文化实践为出发点,以语言为焦点,通过分析语言使用来反映传播双方的“权势关系”,重视挖掘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从而揭露并抵制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黄国文、徐珺,2006)。

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侧重政治的”批评话语分析仅对语料进行解构而没有提出积极的改进方案,忽视了话语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积极作用,不利于社会的发展(Kress,1996)。鉴于此,Martin 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方法,主张对话语分析采取更加积极、正面的态度,通过话语分析增强理解沟通,从而建构和谐的人类社会,这一观点被视作对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种补充(朱永生,2006)。

二、话语分析在国内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研究概念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首次提出,并在 60 年代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Fortner,2000)。广义上,国际传播包括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狭义上,国际传播特指跨国的大众传播(关世杰,2004)。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由美国学者 Edward Hall 于 1955 年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20 世纪 70 年代,跨文化传播逐渐发展为传播学中的独立分支,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入我国,受到了外语界、传播学界等学科的关注(关世杰,2006)。目前,国内外语界、传播学界通常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分别译为“跨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传播”(陆国亮,2021)。尽管两个学科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在文化交流、信息传播、跨文化研究等方面存在交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以大众人际传播为特征的互联网的兴起,国际传播逐渐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延伸,跨文化传播也从微观层面拓展到宏观层面,二者的研究领域日益交叉融合(关世杰,2004)。在国内,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内容亦存在重叠。从中国知网(CNKI)的统计数据可看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涉及“国际传播”主题,而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均较为关注“一带一路”“国家形象”“文化传播”等议题。

表 1 主要主题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Primary Themes)

类型	主要主题分布
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研究、“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传播策略、国家形象、主流媒体、文化传播、中国故事
跨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研究、文化传播策略、传播策略、跨文化、传播视域、国际传播、电视节目创新研究、“一带一路”、国家形象
跨文化交际	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及其人才培养策略、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大学英语教学、外语教学、文化差异

(数据来自 CNKI,以“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为主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后筛选出来源为“CSSCI”和“北大核心”的结果,各主题下的“主要主题分布”前 10 位,已删除各主题关键词。)

为探析国内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话语分析法的应用情况,本研究利用 CNKI 的高级检索功能,结合该领域的主要主题分布情况,采用多个相关主题关键词,包括“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对外传播”“全球传播”“海外传播”“文化传播”“文化差异”“国家形象”“中国形象”“国际形象”“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主流媒体”,结合“话语分析”为篇关摘、关键词分别进行组合检索。通过广泛的关键词组合检索,可以更好地覆盖该领域中的多个相关研究方向和视角,从而识别出更广泛的相关文献。随后,以发表期刊的学术权威性以及与研究领域的相关性为筛选标准,筛选出“CSSCI”和“北大核心”来源期刊下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使用了话语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的文章,共计 139 篇。CNKI 统计结果显示,这些论文主要来源于新闻传播与语言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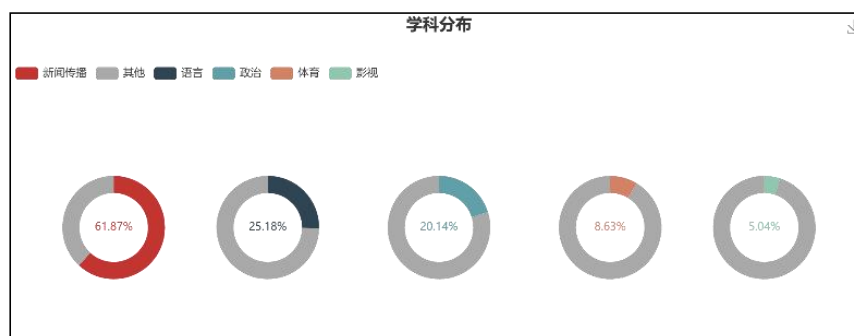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论文学科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Disciplines)

经过梳理,研究发现论文中话语分析法的应用呈现如下特点:

(一) 研究对象集中于新闻语篇

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学者们主要选择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对象展开话语分析研究。在上述 139 篇相关论文中,学者们选取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包括新闻语篇、演讲语篇、广告语篇等,其中选取新闻语篇作为研究对象的共 91 篇,占比约 65.47%,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语篇。话语分析起源于语言学,最初被用于探讨句子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大量话语文本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丰富的研究语料,因而常常成为研究者们所青睐的研究对象。例如,宁海林和常誉维(2024)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的差异等因素,中美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式现代化时表现出明显不同。曾庆香(2016)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2015 年中美首脑会晤”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归纳了两国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异同。

(二) 内容视角分布广泛

从研究内容视角来看,运用话语分析法的文章内容视角分布较为广泛。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信息交流过程中,一般存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特征区分(刘燕南等, 2022)。由于话语主体性的差异,形成了以自我塑造为核心的“自塑”视角,以及集中反映他者对于主体整体想象的“他塑”视角(鄂冠男、侯光明, 2022)。在本研究中,基于对文献中研究对象的话语主体性划分,研究内容视角被概括为三个主要类别,分别为自塑视角、他塑视角以及对比视角下的话语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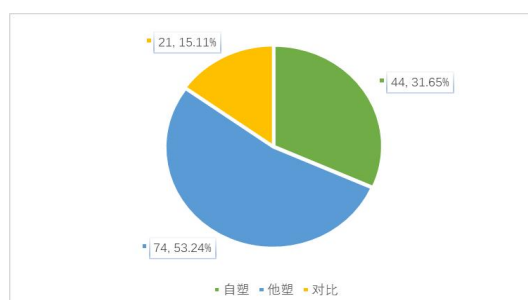


图2 自塑、他塑、对比视角下的研究论文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from Self-Construction, Other-Construct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 自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

自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研究主要指以中国媒体、官方机构等本土主体所生产的话语材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方式（沈悦、金圣钧，2023）。在上述 139 篇文献中，在自塑视角下进行话语分析的论文共 44 篇，占比约 31.65%。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自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主要以中国主流媒体国际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政治文本等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探析自塑话语的表征及影响因素，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等提供思路。例如，基于中国日报网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李旺传和陈先红（2023）发现报道话语具有权威性、真实性、客观性，但报道内容受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中西方文化语境差异的影响，并提出要正视差异、寻求共识、加强精准传播和共情传播的策略。田绪军和李晓倩（2020）对中国外交话语展开历时性话语分析，总结了不同发展时期中国外交话语的语言表征特点，归纳出中国外交战略、内容、目的的演变。

2. 他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

他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研究是指以外国媒体、国际组织等“他者”主体所生产的话语材料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在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既有自我构建的“自塑”，也有外部塑造的“他塑”，其中“他塑”视角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程浩等，2023）。分析“他塑”话语对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话语构建、创造融通中外文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已梳理的文献中，基于他塑视角进行话语分析研究的文章数量最多，共 74 篇，占比约 53.24%。他塑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研究中，内容主要围绕外国主流媒体、组织机构等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意识形态构建等问题而展开。例如，张麟等（2023）以《纽约时报》北京冬奥会报道为例，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探讨西方媒介的话语建构，发现中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争夺、国际话语权争夺等是促使报道话语形成的重要社会文化因素。钟馨（2018）基于 12 份英国全国性报纸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探讨了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意义建构，为国际传播中进行“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提供话语借鉴，从而促进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3. 对比视角下的话语分析

对比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研究是指同时选取中外媒体、机构或组织的话语材料，从而形成不同文化主体话语建构异同对比的研究。对比自塑和他塑话语的差异，明晰“自我”与“他者”话语的不同特征，有助于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建立精准传播和差异化传播的话语框架。在进行话语分析的对比研究时，保证研究语料的对等性是重要基础（胡美馨、黄银菊，2014）。在语料收集时，要确保目标语料规模相当、话语风格相近，从而保证其可比性，因而对语料数据采集和筛选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了筛选和整理所需的资源和成本。在已梳理的文献中，基于对比视角进行话语分析研究的文章数量最少，仅 21 篇。对比视角下的话语分析研究中，往往基于中外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比较，并分析导致中外话语呈现差异的原因，以厘清报道中的“他者化”现象，并探讨“去他者化”的路径。例如，宁薇和郭宇（2020）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香港修例风波”事件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比较，发现《纽约时报》更倾向于使用情境性话语来传递意识形态，从而加强对读者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媒体需要灵活运用情感话语策略，以进一步提升“自述”叙事能力。郭继荣和王馨苑（2021）对《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关于民族问题的报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家媒体报道内容和态度差异显著，西方媒体塑造了一个较为负面的中国形象，并提出中国应提高话语建构自主性和传播有效性，以改善中国国际形象。

（三）理论框架使用多样

从具体的理论框架运用看，研究者们在应用话语分析法时，因为学术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的差异，所使用的具体研究理论框架具有多样性。学者们在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理论框架包括 Fairclough 的三维话语分析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Van Dijk 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等。其中，Fairclough 的三维话语分析理论被使用的频率最高，该理论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相结合，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中一个系统、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泽霞、杨忠，2008）。黄彩梅、李旺传和陈先红、彭修彬等学者都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了 Fairclough 的三维话语分析理论。

表 2 理论框架使用情况
(Table 2: The Use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梳理文献中出现的理论框架前 10 位	数量
Fairclough 的三维话语分析理论	33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	10
Van Dijk 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	6
框架理论	6
评价理论	6
Kress &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理论	5
Charteris Black 的批评隐喻分析法	3
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	2
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法	1
符际互补理论	1

三、话语分析法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反思与展望

根据已有文献的情况，本节尝试反思相关研究还可完善之处，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关注更多的多模态语料，结合定量方法研究

从研究对象的形式来说，研究者大多选取包括新闻报道、演讲发言等在内的文本内容为研究对象。话语的意义中有部分是由声音、动作等非语言因素体现的（张德禄，2009），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话语的内容形态愈加丰富，除了传统的文本外，图文表情包、音频、视频等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话语实践（肖珺，2017）。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涌现出越来越多涵盖语言、声音、色彩等多种符号的多模态语料，这些语料也应当被纳入为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外 Kress 和 Leeuwen（1996）首先提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概念以及视觉语法理论，指出图像具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的三种语法特征，并将其用于对图像的话语分析。

国内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趋势。如表 3 所示，被 CSSCI 收录或入选北大核心的 139 篇文献中，涉及多模态语料分析的研究有 23 篇，在全部文献中占比约 16.55%。这些论文大多基于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Kress 和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等理论对图像、视频等多模态语料进行定性研究，分析归纳多模态话语本体的特征。但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多模态话语特征的描述层面，较少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其中结合定量研究方法的篇目数量在全部文献中占比为 5.75%。总体来说，目前已梳理的文献中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文本语篇类型，涉及多模态语料分析的高质量文献占比相对较少。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多模态语料，将包括视觉、听觉符号在内的多种语料纳入研究视野，探究多模态话语表征体系、话语建构策略等。同时，可结合定量方法的优势，利用语料库分析工具、计算机多模态技术等方法技术，对多模态话语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数据标注，对其中蕴含的社会情境、文化和历史内涵等进行深入分析。

表 3 多模态语料研究情况
(Table 3 Research on Multimodal Corpora)

是否结合定量研究方法	是否对多模态语料进行研究		多模态语料研究篇目数量在全部文献中的占比情况
	非多模态语料研究	多模态语料研究	
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在全部文献中的占比情况）	91(65.47%)	8(5.75%)	23(16.55%)
未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在全部文献中的占比情况）	25(17.99%)	15(10.79%)	

（二）进一步加强理论应用的框架搭建和优化

话语分析法缺乏统一的方法应用步骤，在应用过程中往往涉及多种理论的整合，研究者在方法应用过程中通常根据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选择具体的理论框架。由于缺乏一个连贯的分析模式，批评话语分析往往存在碎片化、示例化的问题(Fowler, 1996)。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话语中包含着多种单元、特征、结构等，实现完全的话语分析是不可能的(Van Dijk, 2001)。也有学者指出，研究者在开始研究时会聚焦于特定研究问题，因此会倾向于关注文本的某些特定领域而非全部内容(Fairclough, 2003)。为了增强话语分析研究的可靠性，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使用了语料库辅

助话语分析的方法或者结合内容分析方法,为话语分析提供词频、词汇搭配强度、索引表征等方面的量化数据,以识别出重要的话语模式与特征,减少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失误(王宏俐等, 2024)。

部分研究在方法应用框架搭建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如对应用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层次分别进行阐述(如黄蕾, 2021; 熊涛、周小兵, 2023; 刘苹、董格格, 2024)、结合理论列出分析矩阵(如李冰、王刚, 2022; 袁小陆、瑞华, 2022; 朱红强等, 2024)等等。这些尝试围绕理论框架与特定研究问题的内在关联展开详细论证,构建起涵盖理论内容、研究问题、分析维度的应用框架,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分析过程的整体透明性,也有助于明晰研究分析的边界,为增强话语分析的系统性与规范性积累了有益经验。遗憾的是,此类尝试尚未形成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研究范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强化话语分析法理论应用框架的搭建,提升理论内涵与分析过程的对接精度;结合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特点,对现有理论框架进行改进优化,不断完善话语分析法的理论应用体系,确保其在研究中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而推动形成具备业界参考价值的成熟研究范式。

(三) 强化受众视角的融入

传统的话语分析往往聚焦于话语生产者及文本,关注话语如何建构、传递意义,而相对的忽略了受众在内容接受端的解读。在主流的大众传播理论中,受众不仅是传播信息流通的目的地,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反馈者,具有很强的能动性(郭庆光, 1999)。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会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群的信息交流过程,在进行分析时往往需要综合考量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因素对受众信息解读的影响。如果仅用研究者的视角代替受众的解读,拘泥于话语生产端的话语结构分析、隐喻识别等,往往会忽略话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多样性。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需要引入受众视角。在 139 篇文献中,有 4 篇论文涉及到了受众视角,运用内容分析、计算机辅助文本挖掘等方法对研究语篇的对应评论区内容进行主题归纳、点赞和追评等数据的分析(罗志伟、王敏, 2022; 刘徐州、郝文, 2022; 姬拓, 2023; 史安斌等, 2024)。这些研究揭示出受众的能动性,为话语意义的解码分析过程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然而,融入受众视角的研究仍是少数,大多数研究还是聚焦于对话语本身的解读。未来的研究除了剖析传播话语本身,还应加强对受众解读的关注,探析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解码异同,从多个维度探索受众解读多样性的深层原因,从而增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 从批判性立场转向更多地挖掘积极话语

在本文检索的 139 篇文献中,有 75 篇文献使用了批评话语分析法,占比约 53.96%。批评话语分析法致力于揭露话语背后潜藏的霸权和不平等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纯粹的批判立场可能会使研究聚焦于对话语作为权利和意识形态载体的“解构”分析,而相对忽略了话语在促进理解、建构共识方面的积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末,批评话语研究者过于鲜明的政治批评立场在西方学界内部也受到关注和反思,澳大利亚语言学家 Martin 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的命题,倡导以积极友好的态度审视话语,关注话语如何通过协商、合作、共情推动社会和谐发展(Martin 2006)。

在已梳理的文献中,研究者们选择的研究对象以政治新闻、社会新闻、政治演讲文本等与意识形态关联性较强的语篇为主,往往采取批评的态度对语篇中的曲解、误读、污名化话语进行解构。只有极个别研究选取其他领域,如来自文学、艺术等的话语语篇,从互动性、语言情感态度等角度探讨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挖掘其中的积极语义、亲和力元素(如熊涛、周小兵, 2023)。

事实上,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领域,话语对公众情感的诉诸日益凸显(李战子,2022)。共通的情感能够跨越文化隔阂、引发公众共鸣,借助情感共通性将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发展实践融入全球传播,可更有效地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姜飞,2021)。相较于聚焦政治议题、社会时政等宏大主题的语篇,影视艺术、文学戏曲、美食民俗等文化类叙事,往往能通过共通的情感元素更易引发受众共鸣。未来研究的对象除政治、社会新闻等宏大叙事外,还可选取侧重认知对接与情感共鸣的生活类、文化艺术类叙事语篇;从“积极话语分析”视角切入,以更为积极正面的态度挖掘话语中与国际受众在价值、情感层面的连接点,从而构建融汇东西文化特质、契合全球受众情感需求、获得广泛认同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

四、结语

话语分析法关注语言本身及其使用,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探析传播意图,挖掘传播规律策略等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工具。同时,话语研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发展进程与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新特征。本文梳理了话语分析各流派分支的特点,归纳了该方法在国内外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情况,结合学科特点反思其应用并提出展望,为未来提升话语分析法的方法论自觉与研究解释力提供参照。由于精力和资源所限,本文仅对中国国内 CSSCI 收录和入选北大核心期刊中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无法涵盖所有中国国内的期刊文献,以及国外文献。期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文献样本范围,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全面性和普适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 Diq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5121-7124>

Shan Yunming ^{ID} <https://orcid.org/0000-0002-3228-6950>

References

程浩、张云笛、黄瑚(2023):超越差异与区隔:“‘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他塑性建构研究”,《当代传播》(03):14-20。

[Cheng Hao, Zhang Yundi & Huang Hu (2023). "Beyond Difference and Compartment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Other-Shaped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03): 14-20.]

丁和根(2004):“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01):37-42+95。

[Ding Hegen (2004). "The Theory, Content and Method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bout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01): 37-42+95.]

鄂冠男、侯光明（2022）：“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武侠电影在英文主流媒体中的话语考察——以《纽约时报》（1982-2021）的报道为例”，《当代电影》（08）：91-99。

[E Guannan & Hou Guangming (2022). “A Corpus-Based Examina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in English Mainstream Media - Taking the Reports of the New York Times (1982-2021) as an Example.” *Contemporary Cinema* (08): 91-99.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4646.2022.08.013>.]

关世杰（2004）：《国际传播学——传播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Guan Shijie (2004).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关世杰（2006）：“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12）：32-36。

[Guan Shijie (2006). “A Ten-Year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12): 32-36. DOI: <https://doi.org/10.26948/j.cnki.dwcb.2006.12.012>.]

Gunther, Kress (1996).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Questions for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outledge: 15-31.

Gunther, Kress & Theo,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郭继荣、王馨苑（2021）：“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建构——以《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为例”，《情报杂志》（12）：120-126。

[Guo Jirong & Wang Xinyuan (2021). “Chinese and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Discourse on Chinese Ethnic Issue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12): 120-12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965.2021.12.017>.]

郭庆光（1999）：《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uo Qingguang (1999).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Ltd.]

胡春阳（2007）：“传播研究的话语分析理论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05）：152-155。

[Hu Chunyang (2007). “A Review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i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ocial Sciences)* (05): 152-155.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3926.2007.05.035>.]

胡美馨、黄银菊（2014）：“《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态度资源运用对比研究——以美军在利比亚军事行动报道为例”，《外语研究》（04）：24-30。

[Hu Meixin & Huang Yinju (201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se of Attitudinal Resources in China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An Example of Coverage of the U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Libya.”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4): 24-3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7242.2014.04.005>.]

黄国文、徐珺（2006）：“语篇分析与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0）：1-6。

[Huang Guowen & Xu Jun (2006).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10): 1-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038.2006.10.001>.]

黄蕾（2021）：“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偏见——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外国语文》（04）：85-96。

[Huang Qiang (2021). “Discourse Prejudice of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Illustrated by the China-Related Report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04): 85-9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21.04.011.>]

马丁（2006）：“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英语研究》（04）：21-35。

[James, Martin (2006).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English Studies* (04): 21-35.]

姬拓（2023）：“全球南方议题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效果提升研究”，《青年记者》（22）：41-43。

[Ji Tuo (2023). “Study on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Enhancement of Global South Issues.”

Youth Journalist (22): 41-43. DOI: <https://doi.org/10.15997/j.cnki.qnjz.2023.22.003.>]

姜飞（2021）：“国际传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益、边界和秩序的接力”，《新闻与写作》（10）：5-13

[Jiang Fei (2021).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Relay of Interests, Borders and Order.”

News and Writing (10): 5-1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295.2021.10.003.>]

李冰、王刚（2022）：“博弈与想象：新闻反转中的国际话语权研究——基于‘英国货车案’的分析与思考”，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6）：57-66。

[Li Bing & Wang Gang (2022). “Game and Imaginatio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 News Reversal--Analysis and Reflection

Based on the ‘Essex Lorry Case’.” *Modern Communication* (06): 57-6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8770.2022.06.008.>]

李旺传、陈先红（2023）：“作为政治话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国际传播考察——基于中国日报网的话语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120-133。

[Li Wangchuan & Chen Xianhong (202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Whole-Proce

ss People’s Democracy’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Daily’.” *Journal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5): 120-133. DOI: <https://doi.org/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23.05.12.>]

李战子（2022）：“评价理论在国际传播语境中的应用与拓展”，《外语研究》（02）：1-6+112。

[Li Zhanzi (2022). “The Renewed Application of Appraisal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2): 1-6+112. DOI: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220406.001.>]

刘苹、董格格（2024）：“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新闻与传播评论》（02）：106-118。

[Liu Ping & Dong Gege (202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Imag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Press Conferences: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02): 106-118. DOI: <https://doi.org/10.14086/j.cnki.xwycbpl.2024.02.009.>]

刘徐州、郝文（2022）：“跨文化传播中的身份审视与重塑：在华外国人短视频传播的‘双重他者’境遇”，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06）：179-195。

[Liu Xuzhou & Hao Wen (2022). “Identity Reviewing and Reshap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ituation of the

‘Double Otherness’ in the Short Video Communication of Foreigners in China.”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06): 179-195.]

刘燕南、潘紫菱、王雪颖（2022）：“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知识生态和共同体建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05）：69-89。

[Liu Yannan, Pan, Ziling & Wang, Xueying (2022). “Issue Changes, Knowledge Ecology and Academic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in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05):

69-89.]

陆国亮（2021）：“交际与传播之争：‘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在华理论旅行”，《新闻界》（10）：77-87。

[Lu Guoliang (2021). “The Conflict Between ‘Jiaoji’ and ‘Chuanbo’: The Theoretical Trav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ress Circles* (10): 77-87. DOI: <https://doi.org/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10818.001>.]

罗志伟、王敏（2022）：“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家品牌实践——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热带地理》（07）：1169-1179。

[Luo Zhiwei & Wang Min (2022). “Nation Branding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the Hainan Free Trade Port.” *Tropical Geography* (07): 1169-1179.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505>.]

宁海林、常誉维（2024）：“中美主流媒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话语分析——基于《中国日报》《纽约时报》的报道”，《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05）：51-60。

[Ning Hailin & Chang Yuwei (2024). “Discourse Analysi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China and USA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China Dail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Modern Communication* (05): 51-60. DOI: <https://doi.org/10.19997/j.cnki.xdcb.2024.05.009>.]

宁薇、郭宇（2020）：“中美新闻报道中的情感话语比较”，《青年记者》（35）：10-11。

[Ning Wei & Guo Yu (2020). “A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News Reporting.” *Youth Journalist* (35): 10-11. DOI: <https://doi.org/10.15997/j.cnki.qnjz.2020.35.005>.]

Norman, Fairclough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Routledge.

罗伯特·福特纳（2000）：《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

[Robert, Fortner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Conflict, and Control of the Global Metropolis*, trans. Liu Liqun.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Roger, Fowler (1996). “On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Eds.). *Texts and Practice: Reading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outledge: 3-14.

沈悦、金圣钧（2023）：“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叙事的多维转向与进路优化”，《云南社会科学》（06）：173-185。

[Shen Yue & Jin Shengjun (2023). “The Multidimensional Turn and Ro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arr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ciences in Yunan* (06): 173-185.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691.2023.06.019>.]

史安斌、童桐（2022）：“理念升维与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大前沿议题”，《编辑之友》（04）：55-62。

[Shi Anbin & Tong Tong (2022). “Conceptual Upgrad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Ten Frontier Topic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ditorial Friend* (04): 55-62. DOI: <https://doi.org/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07>.]

史安斌、张自中、朱泓宇（2024）：“数字华流视域下国际传播的增效赋能——以《原神》为例”，《当代传播》（03期）：88-94。

[Shi Anbin, Zhang, Zizhong & Zhu Hongyu (2024). “The Enhancement and Empower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Chinese Culture: The Case of ‘Genshin Impact’.”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03): 88-94.]

Teun van Dijk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 95-120.

DOI: <https://doi.org/10.4135/9780857028020.n5>.

田绪军、李晓倩（2020）：“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外交话语主题词演变研究”，《中国外语》（02）：16-25。

[Tian Xujun & Li Xiaoqian (2020).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Keywords of the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2): 16-25.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0.02.003>.]

王宏俐、闫开伦、张寅（2024）：“基于语料库与机器学习的推特涉华生态话语研究”，《外语电化教学》（03）：48-55+115。

[Wang Hongli, Yan Kailun & Zhang Yin (2024). “Study of China-related Ecological Discourse on Twitter Based on Corpus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Computer-Assist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03): 48-55+115. DOI: <https://doi.org/10.20139/j.issn.1001-5795.20240307>.]

王泽霞、杨忠（2008）：“费尔克劳话语三维模式解读与思考”，《外语研究》（03）：9-13。

[Wang Zexia & Yang Zhong (2008). “Interpreting and Reflecting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03): 9-1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7242.2008.03.002>.]

魏江楠（2018）：“话语分析理论及方法概述”，《新闻研究导刊》（02）：162-163。

[Wei Jiangnan (2018).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s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 (02): 162-16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883.2018.02.108>.]

肖珺（2017）：“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模型及其对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06）：126-134。

[Xiao Jun (2017).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Their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New Medi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Arts & Humanity)* (06): 126-134. DOI: <https://doi.org/10.3969/10.14086/j.cnki.wujhs.2017.06.015>.]

熊涛、周小兵（2023）：“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化读本的话语亲和力建构”，《现代外语》（01）：97-109。

[Xiong Tao & Zhou Xiaobing (2023).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ff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Books: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1): 97-109. DOI: <https://doi.org/10.20071/j.cnki.xdwy.2023.01.005>.]

杨絮（2018）：“话语分析方法综述：开辟 LIS 研究新视野”，《数字图书馆论坛》（03）：59-67。

[Yang Xu (2018). “Discourse Analysis: Broadening New Vision for LIS Research.” *Digital Library Forum* (03): 59-67. DOI: <https://doi.org/10.3772/j.issn.1673-2286.2018.03.011>.]

袁小陆、乃瑞华（2022）：“‘文化中国’国际传播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研究”，《外语教学》（05）：23-29。

[Yuan Xiaolu & Nai Ruihua (2022). “Research on Multimodal Discourse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Chin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05): 23-29. DOI: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023/h.2022.05.011>.]

曾庆香（2016）：“中美媒介建构‘2015 年中美首脑会晤’框架的符号分析——一种跨文化传播个案的框架分析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4）：16-23。

[Zeng Qingxiang (2016). “A Semiotic Study of Media Framework of China and USA Construction of ‘Sino-US Summit of 2015’: A Path Analysis on the Cas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04): 16-23. DOI: <https://doi.org/10.16783/j.cnki.nwnus.2016.04.002>.]

Zellig Harris (1952).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01): 1-30.

张德禄 (2009):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 《中国外语》 (01): 24-30。

[Zhang Delu (2009). “On A Synthe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1): 24-30.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9382.2009.01.006>.]

张麟、薛文婷、孟潇庆 (2023): “我国国际体育赛事的西方媒介话语建构及其应对策略——以《纽约时报》北京冬奥会报道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02): 117-128。

[Zhang Lin, Xue Wenting & Meng Xiaoqing (2023).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Media Discours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Journal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02): 117-128. DOI: <https://doi.org/10.19582/j.cnki.11-3785/g8.2023.02.012>.]

钟馨 (2018): “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建构研究——基于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07): 61-69。

[Zhong Xin (2018). “A Study on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Discourse in British National Newspapers: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odern Communication* (07): 61-69.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8770.2018.07.011>.]

朱红强、刘心雨、许静雯 (2024): “外宣新闻中的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一项语料库辅助的话语研究”, 《中国外语》 (04): 50-57。

[Zhu Hongqiang, Liu Xinyu & Xu Jingwen (2024).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Rural Image in International News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04): 50-57. DOI: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4.04.006>.]

朱永生 (2006): “积极话语分析: 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与补充”, 《英语研究》 (04): 36-42。

[Zhu Yongsheng (2006).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 Reversal and Complement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04): 36-42.]